

INTERVIEW TRANSCRIPT

丁方访谈

访问：翁子健 日期：2009年3月5日 时间：约59分钟 地点：南京 丁方工作室

浙江美术学院

问：宋老师，我知道您是84年到浙江美术学院读书，当时您非常的年轻。

红：非常的嫩。

问：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对画画有兴趣了吗？

红：也不是很小就有兴趣，其实说过好几次这个问题，实际上15岁以前什么爱好都没有。我上浙江美院的时候应该不到19岁，是18岁。15岁才开始画画，其实只是很短的时间，就上了一个不错的学校。

问：很难才能考上。

红：对，那个学校非常好，后来证明也是非常好的。

问：您小时候画画也是受您哥哥的影响？

红：对，其实我哥是从小开始画画的，他从小就很主动、很自觉的开始画画。(0:01:22)其实小时候，我父母对我是特别绝望的，不知道我要干什么，而且很担心我未来能去干什么。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偶然的的机会：我和外面的小朋友打架，回来以后我爸惩罚我，把我给打伤了，把我的髌骨打裂了，打坏了以后在家里养着，养伤的时候没事干，就开始画画。我记得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美术老师表扬过我，和我妈说过，你们家的二儿子很有这个天分。那个时候家长没有这个概念，我自己也不知道，15岁的时候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就开始画画，而且画的时候挺高兴的，那个时候我哥已经上了天津美术学院了，家里面留了他当时画画的书，还有一些材料，因为他考的是天津美院版画系，有一些木刻的刀落在家里面了，还有板子，我记得当时我们中学课本里面有《一千零一夜》的一篇故事，写了一个渔夫去海里面打上来一个罐子，捞了一天鱼也没捞着，结果到了很晚的时候打上来一个罐子，这个罐子打开以后，就放出一个魔鬼，这个魔鬼就和他说话，我可以满足你几个愿望，好像是这么一个故事，根据那个文章就开始画了一个黑白的稿子，在木板上刻了版画，后来又翻出了当时国内出的明星杂志，就叫大众电影，那里面有一些罗马尼亚的女明星，好看，比中国的明星好看，然后就画女明星，画得很像，自己慢慢的有兴趣就开始做了，我父母一看，我也喜欢画画，画画就不出去瞎跑了，也挺好的，这样就开始画了。我哥在天津美院的时候，我妈写信给我哥说，你弟弟也喜欢画画了，你能不能帮他一下？我哥就特别兴奋，也挺高兴的，觉得以前和我是没关系的，后来发现我也画画以后，就觉得和他有关系了，他也特别高兴。那年的假期他回来，就带着水彩的颜色，还有一些他们同学画的速写、素描的照片回来给我看，一点点的就这么开始了。

问：后来怎么考上浙江美院呢？

红：是挺奇怪的，学了半年多就开始参加高考，其实初中生是不能考大学的。那一年四川美院来山西招生，但是招生的专业很一般，至少我们现在听起来和我们很远，是中国传统的漆器专业，包括漆雕，怎么样去弄漆，是非常技术性的一个系。四川美院当时是很大、很好的一个学院，报考的人特别多，大概有200多个考生去参加考试，只招收2个。当时我学了大概大半年，然后我通过方便的关系就开了一个高中毕业的证明。

问：其实没有毕业？

红：我初三，连高中课程都没学过，因为我妈那时候是中学老师，有这种关系，就开了高中毕业的证明，然后

我就混到队伍里面考试去了。有分初试和复试，初试200个人去考，复试大概是留下了20个人或者是15个人，结果我就在少数的人里面，我才学了几个月，我一下子特兴奋。我就感觉这个东西特别容易，色彩分打得特别高，都是90多分，素描也差不多90分。学了不到半年，进入复试了，觉得特别兴奋。我当时知道肯定是考不上，因为高中的课没学过，高中的课是跟着全国通考的。我妈也特别高兴、我哥也特别高兴，说你去试一下吧。等于就是练一下兵，感觉一下高考是怎么回事，结果你们也知道，肯定是考不上的。接下来复试考的专业课部分是画图案，图案本身和绘画还是有点距离，而且你需要一点最基本的知识，比如说二方连续、四方连续或者是单独纹样，有一些专业性的要求，这些东西我没弄过，你用几套颜色来完成一个图案，这和绘画的随意性是不一样的，复试专业课没过，文化课也没过，开始的时候让我觉得是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

就这样，每年会拿到很多院校的准考证，上海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院、天津美院，每年都能拿到这些学校的准考证，有时候今年会拿到工艺美院的，明年会拿到天津美院的，反正老能拿到。结果到最后一年，拿到浙江美术学院的准考证了。浙江美术学院看到我交上去的报考作业之后，就特别认真的写了一封信过来，就是那种很传统的小楷，毛笔字，竖着写的这种，很认真的一封信：「希望你来我们学校报考，很希望你能考上，同时你要把文化课准备好。」那个时候我的文化课也很一般，也很担心，文化课真的学得不好，因为从小就不好好学习，很多考生因为文化课都考不上。结果就去考，那年同时考了两个学校，一个是考中央美院、一个是考浙江美院，中央美院我忘了是先考的还是后考的了，反正中央美院是考的一塌糊涂。其实我觉得画的是差不多的，但是反差是巨大的。

问：为什么呢？

红：如果是命的话，就是你赶到一个事了，中国人讲「命」。我们那一年考中央美院的时候，正好是中央美院附中那批人毕业，就是刘晓东他们那拨人毕业，中央美院全部定好的名额附中要挪到本科，外来考的这些人全是走形式，所以在中央美院是不及格，素描、色彩都是不及格的，打击的一塌糊涂。浙江美院考完了，又跟着写了一封信：「你专业考得非常好，希望你把文化课考好，争取能考进来。」反差特别大，那年文化课就多出两分，考美术学院当时要求的也低，好像是三门只要过了174就行，我考了176。

问：包括哪三门呢？

红：英语、语文、政治经济学（就是党史、时事），还有一部分是参考分，就是美术史，再有就是印象分的面试，等参加复试完了之后，有成绩不错的就等着面试，看一下，相相面什么的。

问：您当时选的版画系，你哥哥选的还是版画系。您是受他的影响？

红：这是直接的。当时大家考美术学院的时候，对油画系还是特别向往的，但是老是觉得那个东西和自己有距离，因为老师对你的要求，比如说对你色彩的要求、对你油画所谓技术的要求就不一样。版画系考色彩就会相对简单，用水粉画就行了，水粉在纸上画，像水彩一样，一般考生在考学前都是练这套东西，但是你专门拿油画颜色去练是另外一门技术了。当时选择一个方便，和你当时所受的训练有关系，同时也有前车之鉴，就是我哥是上的天津美院版画系，这套东西他都知道。

问：在浙江美术学院读书的气氛很热烈，您在那边有没有受到影响开始多看一些书？

红：如果算我是八十年代的艺术家的话，其实我和我哥他们这拨还不太一样，因为这帮人老说我们是红小鬼，当时20岁左右就参与到85的活动里面，参与到展览里面，但是实际上和他们的年龄最少也得差5岁，和张晓刚差8岁，和毛旭辉差将近10岁。这些人至少和我这个年龄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书本有一种认识，而我们这个年龄其实对书本没有认识，或者说可能是凭着当时的兴趣，或许对某一部小说会感兴趣，但是至于哲学方面的书只是泛泛的知道，比如说看过一些弗洛伊德的书、看过一点萨特的东西，再深一点哲学的东西几乎是看不进去的，到现在为止你再翻开海德格尔、黑格尔，一样还是看不懂，你只能看一个书的梗概，他在阐述什么。

我觉得我当时的直觉就是我更多的看图，然后在浙江美院有一个便利的条件，他有大量欧美的资讯、杂志，比如说欧洲一些美术学院的赠书、资料，学生可以翻阅，图书馆里有大量的这种书，而且它的画册更倾向于现代这部分，和中央美院不一样，中央美院你可能会借到伦勃朗、达芬奇，反正是比较古典的、或者是苏联那套东西比较多，但是浙江美院和他们完全不同，最新一期的《美国艺术》差不多晚半个月、一

个月就能看到，当时我上浙江美院的时候是这样的，每一期的《美国艺术》你都能看到，能知道纽约那边的艺术家在做什么。包括电教室还会放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片子，还会请国外的一些艺术家或者是学院里的老师来办讲座，很活跃，他比较倾向于现当代的感觉。

问：学院的教学是怎样？

红：我当时觉得在课堂上，具体由哪个老师教你，其实和在图书馆里看到的東西反差很大。老师还是沿着和中央美院差不多的方式在授课，它的程序是一样的。比如说一年级你要画一些基础的东西，石膏像、人像，二年级开始画人体，三年级开始涉及到创作，四年级开始进入毕业创作，每个学期都要去体验生活、去乡下画速写、看底下的人怎么生活的，然后整理资料，回来搞创作，上课的程序是一样的。但是你接触到更多的东西是图书馆和讲座，这一部分东西对我当时在浙江美院上学的时候帮助最大。你会有另外一个价值系统来判断你将要做什么，因为学校这些东西是死的，没法超越这个东西，当时我们真正的一个价值系统是学校外面的东西。

在浙美的同学

问：那个时候有什么同学和您一起交流、活动多一些？

红：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处于个人的本能，同班同学不一定知道你在想什么，他也不关心你想什么，反而是跨系的，不同的系或者是不同的年级，比你年级高一点的，你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靠一种本能吸收你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池社」，张培力、耿建翌他们当时画〈今年夏天的第一个光头〉，然后是《又一个光头》。当时画了游泳池边上的《泳者》，还画了《今晚没有爵士乐》。当时他们做了《青年教师》的联展，当时对那个展览印象特别深，包括他们当时在杭州周边的环境做的一些有一点环境加观念的作品，有一点像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东西，然后贴在浙江美院一出门特别长的围墙上，有各种各样太极的动作，我印象特别深是这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谷文达，谷文达对我们前后那几届的学生影响是巨大的，就是说你可以超出课堂范围之内这样做，艺术是可以这样做的，完全跟你所了解的和党校去学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他是中国传统国画系里面的系统，可以演变出这样一个结果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结果，当时对年轻的那些老师也好、尤其是有感觉的这些学生也好影响特别大。后来吴山专他们毕业创作的时候也有些东西。浙江美院永远处在一种大家很愿意去突破一个东西的氛围里面，谁能够制造一个新的玩意，让人觉得很兴奋，而老师其实是不太干涉的，从老师的角度讲，他也许觉得现在年轻的艺术家的、年轻的老师他们在搞什么东西，但是他不是很压制你的，他总是给你提供一种环境，他可以不懂你在做什么，但是他从内心里面来讲，他其实是支持的，是这种感觉。跟当时的中央美院是不一样的，中央美院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北方人很强硬的态度和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相对柔软一些、挺宽容的，所以北方的这帮同学到了杭州上学以后，感觉这挺舒服的，没人压迫你，所以很多人到那都变野了，到了浙江美院容易变野，因为周围的环境很柔软，像水一样的，只有浙江美院的一群人很坚硬、很怪异，反而让你一天到晚很兴奋，莫名其妙的兴奋。

问：您去的时候年纪比较小，有没有去看过谷文达、张培力的行为、展览？

红：我现场看过谷文达的装置，当时浙江美院包括美术报的资料介绍谷文达的也很多，当时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应该是85年、8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国，是最火的时候，我哥一个同学在天津美院的研究生，他出来考察的时来到浙江美院，他问我能不能见一下谷文达？谷文达当时的光环是巨大的，非常耀眼，你要见他一面是很兴奋的一件事。然后我就通过老师介绍，我说可以，去见一下，我记得当时是二年级，我还带着我的素描让他看过，他可能都忘了，画的人体，是习作，当时是去他家里面。当时我哥的同学就问了很多问题，就说你觉得传统和当代怎么样，现代怎么样，中国的未来，问了好多的问题。当时我说谷老师，我还带了习作，你帮我看一下。他当时也说了一些什么，但是和他当时想的完全没关系，有这么一个过程。像张培力他们就没有接触，上学的时候没有太多接触，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毕业了，而且没有在浙江美院任教，他们在杭州，但是没有任教。印象中有一次他们的展览之前，在我们教学楼前面在拍他的油画，或者说在拍他们展览中间其中一个人的油画，反正不是张培力的油画，但是张培力在旁边

站着，在说那个反光了，或者那个角度怎么拍，帮助他一块弄，支了一个自行车，我印象挺深的，当时觉得那个油画画得很好，然后就站在那看了一会。在我们对油画的印象里面是没有那种东西的：很简洁、画得很干净，一般苏联那套东西都是堆在一起的，笔触很多，他那个没有，笔触都很干净。好像耿建翌比张培力低一年级，就看到了耿建翌的毕业创作《灯光下的两个人》，非常的喜欢，今天看也很喜欢，就是他画的感觉很对，很像浙美当时那种氛围，其实他画的那种氛围对我的影响挺大的，包括我画毕业创作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种冷的东西，你到了那个校园里面，校园里面给你提供的东西就是一种冷的东西，大家聚在一起，在一块生活，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关系的，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是一个临时在一起的，那种心理上接触的方式都是一种临时的，就是很脆弱的一种关系，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虽然住在上下铺，一个宿舍，下了课之后，到周末都找老乡去了，你是哪来的，我是哪来的，都是和老乡在一起，如果家是杭州的，就回家了。实际上校园挺冷的，尤其我们家不在杭州的同学会有这种感觉。所以那个东西很像当时你站在空间里面感受的气氛，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男人在干嘛我忘了，反正有一个戴眼镜的女人，两个人坐在桌子前面，拿一张报纸，印象挺深的。那些老先生的油画没什么印象，你看了以后也就是那样，总是让你觉得没意思，那个东西太多了。

电影、小说、艺术的影响

问：在版画系的时候已经有画这些油画吗？

红：我有一个习惯，其实这个习惯和我哥的关系挺大的，当时我上浙江美院的时候，我哥就和我说过，我当时问他意见。因为你要画创作的时候，其实你需要一个想法，你需要一个构图，但是这种东西你不能说你需要创作了它就有，或者给你一段文字它就有，或者给你一个题目它就有，不是的，你必须天天积累。他们当时的同学有一个好的办法，好多人看了电影以后，他会把电影里一个画面用记忆的方式画下来，包括它的色彩、包括它的构图，或者说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把他看到的场景用记忆的方式画下来，每天都画，像写日记一样。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后来我就做了很多卡片，把每天我在路上看到的场景，比如说你们这几个人坐在这里的场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晚上就把它画下来，也许不是还原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组合有意思，我就把它画下来，就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到你毕业创作的时候，你把它一搜网，东西就出来了，总之毕业创作那套东西就是这么画出来的，平时就是做卡片，一个形象的记录。

问：那个时候有没有看一些电影？

红：电影其实对我影响也挺大的，我记得当时的《红高粱》、《一个和八个》、还有一部片子叫《青春祭》，那个片子就没有很多人知道，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这个女导演很年轻就去世了，她是描写一帮知青到了一个山村里面去插队，快要返乡的时候发生了泥石流，把整个村子掩埋了，是一个悲剧，所有人全部都埋在那个村子里面了，一帮年轻人都死在那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看完之后，从电影院出来之后浑身都是发凉的，那种感觉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触动你，特别的冷，冷到家的感觉。还有《大白鲨》，就是美国人拍的，我忘了导演叫什么了，当时的场面挺刺激的。还有小说《百年孤独》，我当时最喜欢的小说就是《百年孤独》。

问：是在学校里面读的吗？

红：是在学校里面读的，好像在学校里面唯一读的一本书。

问：是唯一的一本？

红：也许，也看了很多杂志，但是唯一读的一本书是《百年孤独》。

问：能不能谈一下这本书对您的影响？

红：我觉得《百年孤独》的那种时空、那种混乱的感觉，特别符合当时我感受到80年代给我的印象，它和中国的现实很像，很混乱，连称谓也很混乱，大家所有的价值标准全部崩塌了，因为它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写，中国这么多年的变化其实非常的魔幻现实主义，到今天也是这样的，非常的混乱，一会这，一会那，各种各样的事情，特别像小说里面描写的感觉，不可思议。包括今天我画这些画的时候，我都是沿着

这样一种感受在做，我觉得它没有提供给我一个准确的符号是什么，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如果说张晓刚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对那个时代关于大家庭符号的记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没有的、是混乱的，你只能制造一样，就像方立钧那样，他制造一个形象，制造一个形象它不可能代表永远存在的一个现场，今天的现场更加的混乱，内心的那种价值体系崩溃的感觉特别强烈。

问：那个时候您是不是对超现实主义比较感兴趣？

红：超现实主义我最喜欢的就是基里科。

问：现在看来可能有一些关系。

红：我最喜欢的就是基里科，我觉得基里科的画充满了诗意，包括马格里特的一些画我也很喜欢，他的语言很简洁、很冷，但是他传达出来的意境好像很大，也很抽象，它不是一个具像的东西，你可以借助具像的图形，但是要传达一个抽象的、意向的一个概念。它不是真的一个概念，它永远是一个可变的，或者你过一段时间再去读这张画，它会有变化的意念。

问：您什么时候看过David Hockney的作品？

红：好像上大学的时候就见过。

问：但是没有很大的影响吗？

红：没有，但我很喜欢他的画，我也很喜欢法国的柏尔迪斯（谐音），最早的时候特别喜欢德拉克罗瓦，然后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高更、梵高，尤其是喜欢高更，反正老有变化。

问：所以说受的影响很多样化？

红：很庞杂。有一个阶段也比较喜欢中国传统的东西，比如文征明的山水、包括八大的水墨，石涛的线、怀素的草书，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中国传统的东西，我认为它们都是融合在一起的东西。

问：您当时是和王劲松在一起玩的吗？

红：我在上浙江美院的时候，其实我和他是认识，但是没在一块玩，只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坐在草地上，拿一个饭盆在那吃饭？你来的啊？东北的，黑龙江的，会在草地上聊几句，但是大家没有更多的来往。我当时应该是和油画系的同学关系挺好的，还有和高年级的比较好，同年级的一般。他们上一届毕业，整个毕业生的合影有我。反而到我们那年毕业的时候，毕业生合影的里面没有我。

问：为什么？

红：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补考日语，拍照片的时候正在补考日语，反而上一届毕业的时候大的毕业照里面有我，我站在最后一排，提前毕业了。

问：那一届都有什么人？

红：高一届的是油画系，反正年龄比我大的，比如说来浙江美院进修的，是在各地工作了很多年的人，年龄大的，喜欢抽烟、喝酒，喜欢瞎玩的那些人。和那些好同学不一样的，要稍微丰富一点的，我喜欢跟这些人玩。毕业了，我到北京以后才和王劲松接上火了。我去看他的东西。我的毕业创作他在杂志上看到了，他对我的毕业创作印象特别深，我当时来北京找工作，我找王劲松，王劲松也帮我介绍，他家里面画了很多很奇怪的画，我觉得有点意思，好像和上学的时候不一样了，然后大家就觉得对方画得挺好的，也互相欣赏。后来我到北京工作之后，我们开始接触频繁了，在一块喝酒、在一块玩，在一块聊艺术，后来就想弄一个展览，大家当时都很没钱、都很穷，一个月加上讲课费太120块钱，然后就想做一个展览，当时是4个人，弄到最后那两个人跑了，不干了，觉得做展览干什么啊？还得花钱，我和王劲松说，花钱咱们也做，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咱们喜欢的东西，谁知道能不能卖钱啊？反正要把咱们一年的工作展览一下，一定要展览。王劲松说：行！王劲松当时的经济情况要比我好一些，因为他早来北京一些时间，他认识很多人，还可以介绍画一些插图、做一点图，后来还给我介绍画插图，给儿童出版社画连环画，画《八国联军攻打中国》，我画的是特别热闹，它的文字很简单，因为一画就画几十张，画那种造型，那种大船、开炮，然后各种国家的人拿着枪，从上海登陆，还有一个故事情节，画完了以后好多小孩还写信，问这个叔叔。大概我给儿童出版社画过三套连环画，后来我们就开始赚钱了。

问：每套有多少钱？

红：我觉得最高的一套当时给了我1000多块钱人民币，还给了500美金，那500美金的连环画台湾出版的，等于是境外出款的方式，给的是美金，我当时特别兴奋，挣了大钱了。后来我们就开始卖画了，卖画以后就不接这个连环画了。

问：第一次卖画是什么时候？

红：我第一次卖画在浙江美院的时候就卖过，我的毕业创作，有这么小的铜版画，我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人，当时和浙江美院有一些交流的项目，国外的人在浙美有一个国画的短期培训班，他们来就看学生的毕业创作，有一个人就买了我两张，好像也是500外汇券，那个时候有外汇券，当时我记得是唐宋帮我卖的。唐宋是杭州人，他可能和外国人熟一点，他说你的版画卖不卖？我说卖啊！肯定得卖啊！没钱啊！印象挺深的。

1990王劲松宋永红艺术展

问：王劲松你们两个办展览是在什么时候？

红：1990年，等于现代艺术大展完了以后，现代艺术大展是89年2月份，6月份以前，展览一完了以后就乱了，所有的人因为这一场乱以后，大家的精神就崩溃了，该出国的出国，该改行的改行，很多人不做艺术了。当时4个人要做[90年的]展览，后来不做展览也和这个有点关系，大家就觉得前途渺茫了，觉得你做艺术为什么？没用了。就和现在的金融危机也有点像，金融危机一来，大家觉得不卖钱了，还画画吗？有点类似，我和劲松是90年底一起做的这个展览，我记得我借了2,000块钱，是非常大的钱，你就觉得你还不起，但是还是下定决心借了，不管还不还得起，劲松当时也花了不少钱，我们两个一起还印了请柬，当时在中央美院附中的当代美术馆，现在在隆福寺那条街上，在三联书店边上，但是现在那个学校都已经搬了，就在那第一次做了展览。当时来了很多人，那个时候和老栗不算太熟，然后有邵大箴、范迪安、范叔如、叶永青、李津、还有唐朝乐队的丁武，唐朝乐队当时很火的，丁武当时都来了，我印象特别深。展览很热闹，第二天做了一个研讨会，大家在一起讨论，当时老栗发言最激烈，直接抨击美协、中央美院的做法、包括政府的一些做法，当时印象特别深。老栗对艺术家特别好，他也特别敏感，很快就给我们写信，然后我们进一步再聊，他当时可能感觉到一种东西，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很快就给我们写信，约我们去他们家，再进一步聊，我们又频繁的接触，聊展览的时候其实聊得不多，然后在一块玩，在一块喝酒，老栗后来又到处去，去四川、去广东，去很多地方看艺术家，他发现那种现象，当时刚刚开始。然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老栗拿出一篇文章，就是〈玩实现主义〉，好像是发表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上，我和王劲松当时看老栗写这篇文章，看到老栗的文章里面都有我们的名字，我说老栗，我们要出名了，挺高兴的。

问：1990年那是您第一次比较主要的展览？

红：我想应该是，你参加一个展览或者做一个展览，应该那是第一次。而且非常偶然，但是我觉得这种偶然它联系着一个背景，就是我在浙江美术学院受到的影响和最早我哥对我的影响，我记得我们当时学画画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按照苏联那种方式，就是契斯恰科夫那种素描体系，列宾等等，用苏联那套体系来学，然后去考大学。那个时候我哥已经和我说，这个东西才是最好的，就是指梵高的作品，画的线很笨，然后画得也不流畅，画一条船也画得很笨，我哥和我说，这个东西很好，你要仔细看，我说好在哪？画的也没有契斯恰科夫这套，人家列宾画得多帅啊？你仔细看，这个画得很好。然后我就慢慢体会，就是你在看和自己画的过程中你就体会到什么是好。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也喜欢另外一个画家叫费钦[Nicholas Fechin]，画得很帅，画人物、画少女、画老头的皱纹都画得很帅，但是梵高画得很笨、很拙，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梵高他传达出来的东西带有一种情感，他不是技法的问题，他很笨拙，但是他的画很有感染力，你仔细看沙滩上停的那两条船，每一个结构的连接，他对这两条船的观察和那种虔诚你在画里面感觉到了，我觉得非常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主要就是心灵上的东西，隐隐约约感觉到这种东西了，后来你再去看它，确实是这种东西。梵高的画面里充满了真诚，当时的起点是这样的起点，所以不太一样。

山西现代艺术展

问：您在之前也在山西参加过一个展览？

红：后来我就受谷文达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大场面、大水墨，和传统之间好像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变得特别的兴奋。当时正好也是一个下乡的机会，就是学校体验生活的时间，我哥说：「你来山西吧！我们这做一个展览，我希望你能参与一下。」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说我也没作品啊！没作品我弄什么啊？我完全没概念，但他们都想好了，本来叫第二届山西现代陶艺展，他们烧了粗陶，烧的有点像原始的图腾的东西，像面具、盾牌、陶罐，烧了很多那种东西，他们主要是冲着这样一个展览去做的。我哥说我，咱们布置一个环境吧！做一个表演。我说什么表演？他说你怎么怎么样，我说把这个环境整个衬出来，整个环境需要红的环境，这两个人在里面完全是下意识的在想，做什么不知道，说好了明天一开展就开始做，反正就是照着这种方式去做，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但是很兴奋。我记得展览的头天晚上是通过山西在英国留过学的老师认识的两个英国人，就是白兰女士姐妹俩。[...]

后来通过那个老师认识那两位女士，她们住在太原的迎泽宾馆，迎泽宾馆就在展厅南宫的斜对面，隔一条马路，晚上去她们住的地方喝酒，说明天我们有一个表演，她们说：「好，明天我们一定会来。」她们两个就来了。当时我们就化妆，我脸涂的是白的广告，我哥脸涂的是红的，白的手臂，我是红的手臂，然后裹着布就开始表演，就不知道干嘛，脑子一片空白，因为很多人围着，自己也觉得艺术搞成这样也是有点疯狂，进入到那个环境以后，腿都是软的，脑子是空的。一直在动，没停过，一会这个，一会那个，折腾了挺长时间的，特别长时间，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也没人喊停，没人敢喊停，最后累得不行了，我和我哥说：「差不多了吧！」

问：文字纪录好像说是两个小时。

红：我忘了，时间挺长的，反正没那么长，应该是一个小时之内，还是一个小时左右，我忘了，就觉得时间特别长，停不下来，因为它完全没有情节，你也没有一个剧本，这部完了再有哪一部，没有。和我去的两个浙江美院的同学也傻了，你们到底要表达什么？我说你别问，回头再告诉你。[...]

特别有意思，这个东西登在了中国最著名的《美术》杂志上，彩色的，我躺在地上，我哥坐在边上，注销来的图片特别好，还登了其他一些当代艺术家、当时叫现代艺术家的一些东西。我的一位很保守的老师看见了，说：「宋永红，你的油画画得挺好的，画得挺写实的，那是你画的吗？」我说那不是画，那是在里面表演。他还以为你画了特别写实的油画呢，他觉得那和现实无关，你又登在那个地方，底下也没写什么，他以为那是一张油画。

后来到了浙美的时候，参加过一次浙江青年美术展览。当时我画了一张油画，画了一张陕北唱大戏的一个场面，从舞台上往下看，底下有很多观众，台上有一出戏，这出戏就是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像鲁智深那种刀，挥下去以后，有一个人在舞台上悬空翻起来，台下一帮人看。当时画的是不太写实的，但是整个场景挺有意思，好像入选青年美展了，这张画好像在杭州的画廊里面，我碰到原来浙美毕业的一个人，后来在杭州开画廊，说你那张画在我那呢…我说那张画我走的时候送给一张同学了？怎么卖给你了？他说卖给我了。完了就是毕业创作展，中间在学校里面的习作陈列展每个礼拜差不多都有，比较重要的展览就是毕业创作展，完了以后就是89年那个展览，然后就是和王劲松的展览，再往后就是后八九香港那个展。

到北京

问：你毕业之后88年到北京，当时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

红：到北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就是说你知道了比学校以外的东西还要大的一个东西，就是在北京。你见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搞文学的、搞哲学的，它的层面变多了，你在学校的约束也没有了，你突然一下变得没有方向了，这是特别明显的一个感觉。同时你被一个

更大的东西压着，你想把它变得具体很难，太大了。刚来北京的时候，这个过程其实很挣扎，你怎么样从一个没有目标的情况下找到一个目标是非常挣扎的，因为那个时候同样面临着你对艺术所谓样式的选择，比如说你做过行为艺术、也画过抽象的东西、也画过学院的东西，也知道「池社」，也知道国外很多的实验艺术家，这个时候变成了谁对你都没有要求了，你必须对自己作出一个选择，难度就出来了。我当时一边迷茫，一边就觉得应该有一个具体的事，就是把我的东西收住，我先画画，至于画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选择了油画，后来你发现油画这个东西它确实挺难弄的，挺折磨人的，确实有个技术的问题。[...] 其实油画它是有技术性的，就像你说你画国画，一定有技术性，我们讲要用现代主义的概念去判断这么一个东西，好像它不具备一种前卫性，但是你想掌握它，绝对有技术性的，而且技术难度非常之大。比如说书法、比如说写意，再比如说我要画油画，它里面的技术含量是非常大的，你必须跨越这个技术，但是技术不是目的，但是你必须跨越它、必须控制它，我经历过一段，就是说我怎么样控制这个材料，大概从89年到95年左右，一直在挣扎这个技术问题。想法其实我没有变，从技术挣扎的过程中想法一直围绕着魔幻现实的主题，这个主题没变，比如说写下来像《百年孤独》一样，这种没有意义，已经有人做了，或者你拍下来，那是另外一套技术，你去控制一种技术，你才能把魔幻现实的一面拍出来，我觉得画可能更直接、更简单，或者你更喜欢用这种方式去表达，我喜欢、我选择了画，但是你要控制这个东西需要时间。

1988年黄山会议

问：我知道您后来参加了89年现代大展，是不是通过88年的黄山会议邀请您的？

红：当时的黄山会议是这样的，我86年参加行为，我们的东西发表了，已经有人对我有印象了。第二就是我的毕业创作〈校园生活〉那一组画，大家觉得这套东西和别人不一样，它传达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感受。当然这次开会的时候是我哥把我的作品先带过去的，他们有一个幻灯研讨会，然后我哥又和我说你过来参与一下，我就去了。

问：您当时在北京吗？

红：我当时已经在北京了。[...]这样看到一个作品，大家对你的作品也有一个印象，然后和这些人也都认识了。

问：这些人之前都没有见过面吗？

红：都听说过，比如说栗宪庭、高名潞、费大为、吕澎、水天中，反正印象最深的就是高名潞和栗宪庭，完了就是费大为，费大为的印象当时也特别深。

问：为什么？

红：因为他们在讲，在介绍作品，介绍整个中国的现状和西方的情况，然后再谈这种东西，有开会，印象特别深。回来以后就收到信...邀请参加现代艺术大展，希望包括我哥、我去参加展览。当时正在画两张小的油画，一张是《无人售票》，就是公共汽车里面，还有一张是《天会变化》，就是画的一男一女在一个封闭空间里面焦灼的感觉，是两张很小的油画。还有就是我们86年时行为的图片，就这两部分。我记得我哥当时画了四张抽象的绘画，是综合材料的。

问：您们两个是放在一起的吗？

红：没有，行为那部分是在一楼，一进门右手，油画是在二楼，上二楼以后，是从电梯上楼，又是右手的部分，就这两部分。

问：我们听说过88年的黄山会议，后来发生了打架。

红：这是我最不愿意谈的，哈哈，谈谈也无妨。当时其实也挺无聊，因为喝酒了嘛，喝酒了之后一大帮人在那玩，不是我们惹的祸，是我们当时一大帮艺术家都喝飞了，有一个当地的摇滚乐队晚上演出，演出完了以后和另外一帮当地结婚的人在一个大厅里面，他们就抹黑了脸给人家新娘子敬酒。中国人很忌讳这种东西的，你什么意思嘛，我们一生中就结这么一次婚姻，你来搅我们的局，就不高兴了，其实他们都是当地的人，摇滚乐队的人和当地人先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就乱套了，我们是在大厅侧面的一个小厅里面，外面

也有我们的人，就从外面打进来了，我们是靠在门口的一桌，结果大家都没法吃饭了，就开始打。那个时候饭都吃到一半了，我们的主力都已经上了二楼笔会去了，当时的艺术家可能也有100多人，可能大概有五六十人上楼去笔会去了，包括我哥也不在现场，他们在二楼参加笔会，我们在一楼的该喝酒的喝酒，该和女孩调情的调情，就窝在这了，结果外面打进来了，打进来之后就抵挡不住了，然后周彦从后面开了一个窗户，那种宾馆的一楼实际上是接近二楼的感觉，窗户到底下的高度，因为宾馆高嘛。反正那边有人接应，女孩一个一个跑下去了，女的就从那跳下去了，然后周彦招呼我，也让我从那跳，我是第一个跳出去的男的，前面都是女孩嘛人家不打，完了，一帮人过来，给我打的，打惨了，用瓶子打，酒瓶子乱飞，打晕了，加上又喝酒，打得死去活来的，一大帮人，好像黄山那边的人个儿也不高，感觉一堆小个冲过来，一通的打。打得我一塌糊涂，地上全部是碎的玻璃，而且我感觉迎面一个酒瓶子就过来了，照脸上、脑袋上、后背，无数的地方全是酒瓶子和棍棒的感觉，我当时就蒙了，就趴在地上了，手就按在碎的玻璃上了。这个时候我还有点印象，有一个当地人，但是他是酒店的小伙子，个儿听高的，过来拽着我的衣服和腰带，在高台阶上从人群里面把我甩出去了，那帮人就没再追，我在地上趴了一会，晃悠悠站起来了，我就觉得我的脸已经没法看了，估计已经惨透了，因为感觉血已经顺着脸全部下来了，很黑，底下一点灯都没有，是宾馆的背面，我就顺着背面的楼梯那绕到最背的一个地方[...]我顺着后墙根没人的地方，就觉得当时憋了一泡尿，先把尿撒了，撒完尿以后还清醒，但是已经觉得血特别粘的挂在脸上，然后就从后墙的一个门进去，大概知道自己住几号房间，就上去了。

问：您是一个人？

红：一个人，那些人没追过来，我哥也不知道我在哪，然后我就上楼了，上楼之后到洗手间一照镜子，嘴肿的比非洲人还要厉害，完全土著的感觉，嘴翻开了，然后我一看，里面的隔层全部打断了，这么大的一个口子，现在嘴唇还有一点不对的感觉，然后血就顺着脸下来了，我一看手，这整个就是断裂了，这个地方还有缝针的印儿，是当时扶地的一瞬间。当时我进宾馆门之前碰到老栗了，老栗端着一杯茶，他住在我隔壁：「哎呦，你怎么了？」我说没事，摔的。我一进去就绝望了，完了，破相了，脸完全没法看了，后来我哥不知道听谁说，马上过来了，进房间以后就和我讲，好像还要冲出去和人家打，我说别去，去咱俩都死了，外面几百人等在宾馆外面。我说等一会，我先洗一下，我看哪坏了，他说你的头上也破了，赶紧先去处理一下，我说出不去，外面有人呢，一堆人等着呢。过了一会高名潞来了，一开始是对方他们被打了，鼻子破了，但任何人都没有我严重，等于我成了一个条件，我们这的人受伤多严重啊？后来才把这帮人放走，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原因，最起码是一个筹码，伤得一塌糊涂。

我当天晚上就去了医院了，有他们当地的人陪着，我哥也去了，医生一看就知道是打架，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不是外地人和本地人，这没关系，只要你打架，医生是非常狠的，觉得所有的打架都是有问题的。然后擦碘酒、缝针，头上大概缝了十针，没有麻药，所有的地方都不打麻药，就直接缝，和缝衣服一样，和纳鞋底子一样，你见过中国人纳鞋底子吗？就是一针一针的缝，我能够感觉线穿过头皮，线一针一针的拽过去，头是干的，那个时候头发也长，比现在还长，干在那里。我那个时候已经在工艺美校当老师了，第二天要回北京的，嘴肿得一塌糊涂，没法回北京，然后我就回到浙江美院，当时比我低一年级的有几个同学和我关系不错，让我在学校宿舍住了一个月。这边我给我们同事打电话请假，那面我一个同学让我在宿舍里面住一个月，等消肿了以后再回去。特别惨。

问：现在感觉怎么样？

红：没事，还行，大体上还行。

问：那次之后您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

红：过了15年以后，有一个算命的和我说，每一次你要提升的时候，都要受皮肉之伤的。后来我回忆一下，可能有道理。刚开始画画的时候我爸就把我骨头打裂了，那之前不画的，必须把骨头打裂才开始画。然后黄山会议受了很大的重创之后，就参加现代艺术大展了。

问：您近年来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红：去年有一次，去年是和朋友喝多了摔跤了，把脸摔肿了，那不算。

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

问：89年的大展您去了吗？

红：我去了。

问：当时有什么印象？包括开枪等很多的行为。

红：我觉得所有和艺术相关的那些人在现场都是非常兴奋的，我相信是，包括那些策展人，包括那些艺术爱好者，包括参展的艺术家，所有人肯定都是兴奋的，恨不得一个礼拜不睡觉那种感觉，脚都不粘地，所有人都是飘的。当时也发生了很多事，一会封展，一会有人写恐吓信，一会有人放枪，一会有人在酒吧里面民主人士签字，当时大家的氛围特别飞的感觉，不像现在的人，可能心态不如那时候单纯，那时候的人可能更单纯一些，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然后也特别飞，就像做梦一样，就特别兴奋，每一个人都特别兴奋。

问：您的作品是放在楼上？

红：一楼也有、二楼也有，如果加上两张油画、加上行为的话，应该是三件作品。

问：有没有和观众谈您的作品？

红：这个方式和香港不太一样，因为香港的观众挺喜欢和艺术家讨论的。到今天其实中国的观众想和艺术家讨论，他准备的知识好像也不太一样。和我在境外接触的观众是不太一样的，我在香港碰到一些观众，他会很热心的想跟你讨论你要表达什么，他怎么去理解，有这种。但是在国内好像不太一样，或者他不是这样一个方式去交流，他或许可能通过别的资料、网上、杂志先了解你，他去看你的画就行了，顶多是认识你或者不认识你，方式不一样，一直都是这样的。

问：那个时候您应该算是比较年轻的艺术家，还有刘晓东、方力钧。

红：我应该是最小的，我比他们都年轻。刘晓东是63年的，方力钧也都是63年的...现在很多人都说我是参加革命早的红小鬼，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每一个阶段能出一些作品，有意思的作品，这种很难。因为参加早和晚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完整的认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产生有意思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不是说你的作品越多越好，有价值是很难，我觉得是越来越难。

问：唐宋、肖鲁的作品您有什么看法？唐宋是你的同学吗？

红：唐宋是我的同学，比我低三届。肖鲁和我同一届，他是油画系的。在学校的时候，我和唐宋很熟，我们两个经常会在酒吧里面聊艺术到两三点，唐宋那种很阴沉的、对艺术很邪教式的那种状态，他不一样。刚刚说到和学校交流这一块，其实和唐宋交流挺多的。再过了20年之后，你再接触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当时的交流其实是一种真空，它没有内容，就是说你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你喜欢摇滚，你为什么喜欢摇滚不知道，它和你自己的内心没有一个真正的对话，那个时候大家在谈艺术的时候还存在着这个问题，那个时候虽然都谈得很晚，谈到三四点，或者谈到天亮都没有结果。再过了20年之后，你再看唐宋今天的状态，似乎是跟那个有点对接不上，反正说不出来那种感觉，或者现实和艺术家是不是有错位？或者是理想出了问题还是现实出了问题了，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矛盾，一个没法解决的矛盾。

肖鲁我觉得也很奇怪，当时她上学的时候，她画那些画和她的打枪没关系，不是咬合的很紧的东西，他画画就真的是画画，他做行为就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我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是一个年级的，包括后来她从澳大利亚回来之后，我们也有过交流，也谈过关于她当初放那一枪的概念。艺术家的初衷和社会给他的评价是有出入的，而这种出入和他最后产生的影响是没有人去追究的，社会需要的是一个结果，就是你在那个时间里需要一个结果，不管你坚持的是什么。比如说谁谁谁对艺术特真诚，但是没有有一个东西能达到那个程度，能爆炸出那个效果来，就无效、没用。当时很奇怪，她在那个时候就做了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成立了，那个时间、那个环境和整个人当时的状态就成立了，他的震动是最大的。

问：当时有没有觉得他破坏了艺术？

红: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其实当时主办者的态度是想把这个展览平稳的过渡、做成，不要出事，其实肖鲁的计划是没有向组织汇报的一个行为，很突发的东西，所有人都不知道，当时的主办者其实是很愤怒的，不是说官方，就是说咱们自己主办的人，你居然不告诉我你做这样的东西，很愤怒，但是过了很多年以后，态度是360度的大转弯，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

问: 您参展的两个作品卖了多少？

红: 当时卖了2,000人民币，是很大的钱。

问: 卖给了什么人？

红: 是一个美国厂家，我当时记得是孔长安负责销售这一块，孔长安通知我的，说你什么时候过来拿钱吧！我说多少钱？他说2,000块钱，我说大钱啊！2,000块钱人民币。

问: 不是您定的吗？

红: 好像也和我有关系，好像是500或者600美金。当时是1:4还是1:5我忘了。好像是1:5，400美金，2,000人民币。[...]